

前 言

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已成为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过渡过程中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热点”问题。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保持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究其原因，这既是中国各民族数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历史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形成并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更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又使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 我们也必须冷静、清醒地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世界性。民族问题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失，也不会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而消失。在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往往同宗教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外民族矛盾激化则必然对国内民族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尽管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关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同样史不绝书；尽管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史，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

发展也曾几经反复并遭受过沉重的挫折。所以，虽然我国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形势大好，但我们万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

今天，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期，与这一巨大的社会转型相适应，21世纪，我国在民族发展中要实现两大目标：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内实现国内各民族共同繁荣，逐步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一项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期、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稳定有序的转型，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两大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就国内情况而言，要使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从现实起点上逐步缩小与全国一般地区的差距，其所面临的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难度以及社会变迁的急剧程度将远远超过全国一般地区，这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少数民族群众都想加快发展以尽早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但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总有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些，一部分地区发展慢一些，在一定时期内，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日趋扩大，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就会因期望值过高而产生新的失望。又如，改革过程中必然要对原有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与重组，利益格局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格局变化，危机感、失落感和新的不平等感便会由此而产生。再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扩大和经济的加速发展，必然引起各民族原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的广泛、深刻的变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双向冲突与调适，便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尖锐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国社会便难免陷入动荡与分裂之中。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化转型过程中陷入长期动乱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他指出：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①这种理论当然不会完全适合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他发展中国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引为鉴戒。

从国际情况来说，21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崛起面对的是强手如林的世界，面对的是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大竞赛，这种竞赛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竞赛，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民族亲合力亦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竞赛。这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郑必坚同志认为：所谓民族亲合力，在我看来，应当包含各民族之间的合力和每一个民族的活力这样两个侧面。活力，是说每个民族是死气沉沉，还是蓬勃活跃，不断发展。合力，是说中华各民族之间是相互团结、互助合作，还是互相拆台、互相抵消。如果一个民族内部没有活力，各民族之间没有合力，那么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就不可能是强大的。^②这就是说，21世纪中华民族要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立足与生存，要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压力下获取我们应有的地位，要在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大竞赛中实现振兴与崛起，必须依靠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因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3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郑必坚：《重视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十辑第8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问题。

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云南的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以云南为对象研究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问题，是想通过对一个典型地区的具体解剖，总结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和探讨影响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隐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引起更多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书若能对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有所裨益，若能对全国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提供一个典型地区的经验教训及其问题与对策，我们的研究目的也就达到了。由于时间仓促，调查得不够全面，加之我们研究水平的限制，本书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乃至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地理基础

我国古人在议论天下大势时 常常把“天时（时势与机遇）”“地利（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人和（群体团结、人心向背和人的主观努力）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 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天时固然不如地利，地利固然不如人和，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可以任意分割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换句话说，“人和”这一成就大事的最优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 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①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在日趋减弱，然而，即便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因为一个十分浅显但却颠扑不破的事实和真理摆在人类面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再高，科学技术再发达，人类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而任意创造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5 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那么，地理环境怎样影响历史发展进程呢？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是通过物质生产这一中介来影响人类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发展的。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②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考察，自然便要从云南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出发。由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与部分的紧密联系使得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不时时受到全国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中华民族关系的格局又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因此，本章在重点考察云南民族关系的地理基础之前，有必要首先谈谈我国的地理结构和地理特点对中华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关系的影响

我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领域进行归纳和概括。但从地理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有几大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59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 2、3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元起源和众多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

中华民族的家园就其辽阔和广大而言，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屈指可数。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及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发现则表明，古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广袤与宏大堪称世界第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宽广的平原，巍峨的群山，巨大的盆地，壮丽的高原，冈峦起伏的丘陵，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众多的江河湖泊。气候自南而北，随着太阳的辐射和气温的变化，依次出现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六个温度带，降水量则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这种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的总体气候特征又因地形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从而形成丰富多采的自然景观和多种多样的人类生存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成为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先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便已初见端倪。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各省区的大量发现而日趋明朗。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费孝通先生指出：“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①。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亦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② 这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2、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转引自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第5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些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为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分别创造和发展着各自文化的人们集团，经过氏族部落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许许多多的民族为着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在自己居住的地理环境下从事物质生产，自然环境和劳动对象的不同便导致各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民族文化的不同，民族差异和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格局便由此形成并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也互相接触、互相交往、互相学习和互相竞争，民族关系便由此产生并长期发展，不同的民族分布和民族交往格局亦同时决定着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因此，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民族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华民族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方面。

（二）我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①从而对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区域、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条件。苏秉琦教授曾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把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区：

1. 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包括东北、北、西北）地区；
2. 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 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

参见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载《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5. 以苏(江苏)浙(江)鄞(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包括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几省)地区。^①

有的学者又在苏先生区系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甘青文化区，并把云南和西藏从南方文化区中划出来，专设西南文化区，^②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区域、多中心发展的格局。

上述诸多文化区内都有许多自然条件较好、物产十分丰富的地区，在古代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区域内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给自足，从而造就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局面反复出现，地方民族政权竞相崛起的地理基础。^③

然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环境又具有整体统一性。首先由于中华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自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因而使我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比外向发展更为容易。我国位于亚洲东部，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大海从东南，广漠无边的草原与沙漠和人烟极稀的严寒苔原从北面，冰峰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从西北面，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从西南面，横断山脉江河峡谷和热带丛林瘴疠从南面，把中华大地环抱起来，构成我国各民族外向交流与发展的天然屏障。历史上虽有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宛如三条玉带把我国各民族和西亚、南亚、东南亚、欧洲以至

①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 302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参阅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④ 均参见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载《中国古代文化史》第 1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北非诸国联系起来，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些通道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在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外向发展从未成为主流，外部影响也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各民族的内向交往虽然也同样面临着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但内向交往的地理屏障与外向交往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动员全国力量修建了许多官道、驿道、栈道等，大大方便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

其次，我国天然形成的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为周边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地势最高的一级。由青藏高原向北跨过昆仑山、祁连山，向东跨过横断山，地势急剧下降到海拔 1000 米—2000 米的浩瀚高原和盆地，是为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在此相间分布。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巫山，南至云贵高原东缘一线以东，是海拔在 1000 米以下的丘陵和 200 米以下的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是为第三级阶梯。这种地形从单纯的地理角度来讲，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而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讲，则更像一只巨大的破了一个口子的碗，碗心就是中原地区，碗边便是周边多元文化地区；正像碗边的水总是要流向碗心一样，周边多元文化也因外向的阻隔和内向的三级阶梯地形而自然

向中原地区汇聚。^①

第三 受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东西、南北交结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影响，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便日趋增强和巩固。如前所述，在南北气温逐渐递降，东西雨量逐渐递减这两大气候规律的作用下，我国气候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这就自然形成我国东西、南北两条地理过渡带：一是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青藏干寒高原区之间的东西过渡地带；一是南方温湿环境区和北方半干旱温暖环境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两条过渡带恰恰就在传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即今日的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相交结，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形结构。^②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就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纵轴上 南端是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中间是 80 万年—75 万年前的蓝田人，北端是 70 万年—50 万年前的北京人。而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则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横轴上，西边是黄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前 6000 年—前 5400 年）—仰韶文化（前 5000 年—前 3000 年）—河南龙山文化（前 2900 年—前 2000 年）。继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东边是黄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 5400 年—前 4000 年）—大汶口文化（前 4300 年—前 2500 年）—山东龙山文化（前 2500 年—前 2000 年）—岳石文化（前 1900 年—前 1500 年），继岳石文化的可能是商文化。为什么位于十字结构

① 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第 9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 10、11 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交结点上的中原地区能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呢？究其原因，一是东西、南北地理过渡地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二是位于交结点的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条件较好、降水适中，有利于旱作农业的发展。三是受碗口水向碗心流效应的影响，位于最低一级阶梯的中原地区自然成为周边多元文化的内向汇聚地。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完全独立或很少与相邻文化区交往的文化中心，其水平一般都低于那些具有广泛交往和相互影响的文化中心。^① 中原地区正是在周边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地区的。而这个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周边辐射与扩散，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形成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便随着汉族的四处迁徙而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体的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所以苏秉琦教授说：“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也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② 他还指出：“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③

（三 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特点 使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众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

①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 10、11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 225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 302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相补充的关系

中华大地东西跨 60 多个经度 南北跨 30 多个纬度 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早在 1935 年 胡焕庸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东西两半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人口分界线，从这条分界线可以看出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别。这条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 沿阴山河套 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 再南至云南腾冲。东部为面向海洋的季风湿润区和汉族聚居的农耕文化区，地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40%，人口却一直占全国的绝大多数，近千年来一直保持占有全国人口的 90% 以上。西部为背靠欧亚大陆的干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游牧文化区，其间也穿插分布着若干河谷与绿洲农业区。这里地广人稀，地域占全国总面积的 60%，近千年来人口通常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0% 以下。陈连开教授将我国划分为南北三条发展带，大致是：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 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② 这种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民族分界和经济文化类型区别，既分野清楚而又天然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因为无论是农业民族、游牧民族还是狩猎民族，仅靠单一的生产方式要维持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样，相互之间就

① 参见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载《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载《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必然产生互通有无的需要。农区耕种和运输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需要马匹，农民需要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牧区和渔猎区则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等生活必需品。这种相互需要及其随之而来的经济性的贸易和交流就像一根纽带，把农区汉族和牧区、渔猎区的少数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各民族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

二、云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云南是我国的一个多民族边疆山区省。全省 5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 26 个，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 4061 公里。全省山地面积占 94%，河谷平地 and 坝区占 6%。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与全国民族关系主流相一致，又具有云南特点的民族关系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云南各民族所依托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使云南成为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和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

云南省位于东经 97°31′ 至 106°12′ 北纬 21°8′ 至 29°15′ 之间。东西横跨 864.9 公里，南北纵跨 990 公里，总面积 39.4 万平方公里。全省地势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体分为三个阶梯逐层递降。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德钦县境内的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海拔 6740 米，是云南的最高点。滇中高原为第二级阶梯，海拔一般在 2000 米左右。西南部、南部为第三级阶梯，从北向南，平均每公里降低 6 米，最低点在河口县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海拔仅 67.4 米。省境西部为横断山脉及其余脉，几条大江大

河顺着山势地形呈扇形向东(金沙江)向东南(红河)向南(澜沧江、怒江)流去。高山南北纵列,大江成帚状展开,高山峡谷相间。高黎贡山是恩梅开江与怒江的分水岭,怒山是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云岭是澜沧江与金沙江的分水岭。各江强烈下切,形成气势磅礴的三大峡谷。省境东部是云贵高原的主体,亦称滇东高原,地形波涛状起伏,大面积的土地高低参差,而在一定范围内又有平缓的高原面。如从宣威起经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海拔 2000 至 2200 米,顶端平坦圆浑,形成一系列山间断层盆地,称为“坝子”,有的成群成带,按一定方向排列,有的则孤立地镶嵌在山峦之中。省境南部及西南部和东南部为中、低山宽谷盆地,冲积坝子较多。全省共有大小坝子一千四百个,总面积 2.4 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集中在滇东高原,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坝子共有二十五个。

全省有大小河流六百余条,分属于六大水系。一是伊洛瓦底江水系,其上游在云南境内。二是怒江水系,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自西藏流入云南,经怒江州、保山地区、德宏州,从潞西县进入缅甸为萨尔温江。三是澜沧江水系,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自西藏进入云南,经迪庆、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由勐腊县流入老挝为湄公河。四是金沙江水系,发源于青海西南部,自四川、西藏交界处流入云南,经滇西北、滇中、滇东北,从水富县流出云南后与岷江汇合成为长江主流。五是红河水系,有元江和李仙江两大支流。元江分别发源于祥云、巍山两县,经大理、楚雄、玉溪、红河等地州,从河口县进入越南。李仙江发源于南涧县,经景东、镇沅、墨江、普洱等县,从江城县进入越南。六是珠江水系,上游是云南境内的南盘江和贵州境内的北盘江。南盘江发源于曲靖市,经曲靖、玉溪地区和红河、文山两州,在罗平县流入广西,与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此外,云南还有大小淡水湖泊四十多个,是我国西南省区湖泊最多的省份。

由于云南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临辽阔的印度洋及太平洋，正好处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的控制之下，加之纬度较低，高山深谷海拔高差悬殊的影响，形成全省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其基本特点：一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由于地处低纬高原，空气干燥而较稀薄，各地所得到的太阳光热的多少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而增减。同时，因海拔较高，气温随地势升高而下降。夏季，阴雨天多，太阳光被云层遮蔽，温度不高，最热天平均温度在 19 摄氏度至 22 摄氏度间。冬季，由北方来的冷空气受山脉和高原阻挡，势力微弱，与由青藏高原南侧来的西南暖气流在昆明到贵阳之间相遇，形成“昆明静止锋”。位于静止锋以西的云南处于暖气流一侧，晴天特多，日照充足，温度较高。最冷月均温在 6 摄氏度至 8 摄氏度，年温差一般只有 10 摄氏度至 12 摄氏度，日温差在冬春两季可达 12 摄氏度至 20 摄氏度。二是干湿季节界限分明。雨量充沛而分布不均，降雨量因季节不同而差别很大，夏秋季节，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携带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沿着南低北高的地势爬坡而上，降水丰富，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水 1000 毫米以上，但 85% 的雨量在五至十月降落，其中又以六、七、八三个月降水量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故称雨季。十一月至次年四月的冬春季节，季风改变，降水量仅占全年雨量的 15%，故称干季。降水量在地域分布上也很不均匀，往往在山脉的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少。三是气候垂直变化显著。由于水平方向纬度的增加和垂直方向上海拔的增高相吻合，造成全省八个纬度间的温度差别，等于全国水平方向上 1400 公里至 2500 公里的气温变化，相当于从海南岛到长春所跨越的纬度，呈现出寒温带、热带气候。同时，在高山峡谷中，从谷底到山顶，由于海拔上升而产生“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差异。在西部三大峡谷中，谷底是亚热带干燥气候，酷热如蒸笼；山腰则清爽宜人；山顶终年冰雪覆盖。在梅里雪山下横跨澜沧江的西当铁索桥，从桥面至卡格博峰顶，高差 4700 米，两者

之间直线距离仅 12 公里 但其自然风貌从亚热带干热河谷到冰山雪野,竟相当于从广东到黑龙江所跨过的纬度,为全国所仅见。而在海拔 1500 米—2000 米的高原和盆地 则表现为‘四季如春,一雨成冬’的气候特点。

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成云南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使其成为世界闻名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 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的植物类型都有分布 高等植物达 1800 多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野生动物种类之多 亦堪称全国之冠 仅脊椎动物即达 1638 种 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形成寒温热带动物均有、动物种类南北东西交汇的奇特现象。更重要的是,许多植物和动物为云南所独有,因为西部横断山区自中生代以来,地质运动相对稳定,基本上无大面积冰川覆盖,成为许多动物的“避难所”,使一些古老的原始种类和子遗种类得以保存下来 成为不可多得的‘野生动物物种基因库’。^①

上述材料都是当代的记录,与有人类活动的上百万年前的洪荒时代相比,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前所述,云南因处于我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过渡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从距今 170 万年前元谋人牙齿化石所在的地层中还出土了 29 种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云南马、牛、鹿、象、原始麝、剑齿虎等。从哺乳动物中多为草食类,以及植物孢粉谱所反映的气候和植被生态环境看,元谋人生活在比较凉爽的草原—森林环境中。^② 这种环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以云南还发现了晚更新世时期的晚期

① 参阅《当代中国的云南》上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冯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刘小兵:《滇文化史》第 4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